

迈开“两条腿”，上海稳步走向2035

方翔

孙绍波画

昨天下午，上海召开高规格会议，对实施《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2035”）作出动员部署。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强调，要坚持以规划为引领，进一步坚定追求卓越的发展取向，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抓好规划实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这两大落脚点，在规划的细化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努力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上海2035”是党的十九大后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规划期至203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为申城发展及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指明方向。根据规划，上海城市性质定为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

在“全球城市”前面加上“卓越”，是体现上海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追求和决心，“上海2035”对标的是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因而这些城市的经验更具参考价值。

伦敦的经验显示，国际金融中心须以金融功能核心区作支撑，金融功能核心区量不在多，地不在大，关键要具有发展金融业的独特资源禀赋，“做精、做高、做强”，使之具有真正的国际影响力。在纽约最近一次城市升级中，银行、咨询、创意设计、广告、计算机迅速崛起，再配合传统房地产行业、新兴高技术服务行业、文化产业，终于造就今天的纽约。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全面增强城市的核心功能，而疏解非核心功能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优化功能。

另一方面，注重城市高质量发展，也要补齐影响发展质量和整体水平的短板。在精细化管理上下绣花功夫，使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更有温度，特别是要保护好历史建筑和风貌街区。建筑是文化的“容器”，是心灵感悟和精神体验的重要空间，更是增强城市吸引力、影响力、创造力的重要载体。正如李强书记所说，“上海的特色不仅体现在浦江两岸的摩天大楼上，更体现在十里洋场、万国建筑上，体现在梧桐树下的小洋房、里弄小巷的石库门。”

除了高质量发展之外，高品质生活也是规划实施的根本落脚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高品质生活的核心就是让所有工作生活在上海的人

们都能感受到城市带来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对于每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来说，获得感不是抽象术语，而是实际存在于教育、卫生、就业、养老、住房、文化体育和助困帮扶等基本公共服务之中，只有让公共服务更便捷可及，同时着力解决交通等大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难题，人们的获得感才能提升。

安全感不仅指当下的个人获得感，而且要求未来的社会公正、生活保障，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高等级公共服务供给，建设一流文体设施，使上海成为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宜居之都。

幸福感是在获得感、安全感基础上的最高层次的满足感，它是人的生活期待与能够享受的客观条件相符合的主体满足感。因而，需要着眼未来城市对生态环境的更高要求、更严标准，打造更多优美的生态空间。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国际最好水平，用心用情、精准发力、久久为功，为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这一世界级难题探索“上海答案”。我们有信心，到2035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弄堂里的“红色强音”



■ 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安慎坊弄口



■ 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

(均为资料图)

专家
点评

红色文化之源

上海虹口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区，也是上海党的诞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虹口是中共早期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宣传动员、组织建设、城市武装斗争、文化领导等重要工作的集聚区和实践地。某种意义上，虹口也是中国红色文化之源、中国红色文艺之源。

最近，虹口区做出了推进文化强区建设的决定，下发了加强红色文化建设的意见，正积极打造“四川北路红色文化生态示范区”等，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王佩军（中共虹口区委党史办主任）

共中央宣传部旧址，充分利用石库门的过街楼、前间和后间，一旦敌人搜捕，可迅速撤离。”

“除了地理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虹口的文化和出版环境，”徐有威说，“中国第一个书局——同文书局、同文书会先后在虹口创办，并出版《万国公报》。1899年，《万国公报》分四次连载了《大同学》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共产党宣言》，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虹口四川北路一带又是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这都间接促成中共中央宣传部选择虹口，并最终在四川北路办公。”

资料记载，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共产党愈加深入中国社会、深入工农群众，积极培育各类群众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比如组织补习学校、农民同乐会、工友俱乐部等等。同时，中共还借助群众组织和宣传活动深入工农群众，发展基层组织。以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初的沪西工友俱乐部为例，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活动既有平时的游艺会、识字补习、工友讲演，也有深入的罢工、反帝宣传，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应该说，中共四大后的宣传工作不仅仅限于宣传动员，不再只是口号与主义的鼓动，而是更深入地开展组织工作，与现实政治斗争目标结合起来，为以后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全国群众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十二条具体办法，切实加强中央宣传部工作。

弄堂传出“红色声音”

中共四大后，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工农运动，党员和党组织数量大幅增加，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出现新的革命高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1925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设在上海福生路（今罗浮路）一条弄堂；翌年4月，又迁至北四川路安慎坊（今四川北路1649弄）32号。1926年春至1927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此办公。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设在过街楼里，前间是《向导》编辑办公室，后间办公室兼存放图书资料。

彭述之、沈雁冰、郑超麟等均在这里工作。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丛书等在此编辑。中央局有时在此召开会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秘书郑超麟等人住在这里。

据记载，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曾居住于此，听取起义工作汇报，还在这里起草《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宣言》。周恩来也曾在此工作、居住。1927年4月，党中央迁往武汉后，此处改为中央交通处。198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由郑超麟等寻访确认。

虹口散发“红色魅力”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何会落脚虹口？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认为：“虹口当时的南面是公共租

界，北面虽是华界，但也受到租界影响，有点类似‘三不管’，即使地下工作被发现，撤到公共租界也较方便，更重要的是，当时虹口房价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也是当时不少中央机构及地下工作者定居虹口的重要原因。”

徐有威认为，虹口距离北站近，北站是当时上海重要的铁路枢纽，同时虹口北外滩黄浦江沿岸也是上海客货航运的重要码头，相比别处，虹口陆路交通和水上交通便利。晚清以来，中国众多仁人志士大多从虹口北外滩码头登船出发，一大批党的早期领导人也都是从这里出发，虹口成为中国近代开放之门。“虹口还有个优势，就是石库门多，对隐蔽工作很有帮助，像中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方翔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为迎接革命高潮，在虹口召开的中共四大加强和改善党的宣传工作，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提出